

我这一辈子的职业，非常简单。离开学校，在“文革”的风暴中去贵州山乡插队落户，当“知青”。知青其实不是一个职业，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。从字面上看，“知青”两个字是知识青年的简称，现在许多五六十岁和将近七十的人，时常还自称“知青”，比如自称“江西知青”、“新疆知青”、“黑龙江知青”——明明已经是老头老太了。所以我说，“知青”只能说是一个称谓。

离开“知青”生涯，我就成了文联的人。这话虽然非常明白，却还得仔细解释一番。

调我进城的是贵州省文联，我的工资也在文联财务科领，不过我的工作却是在贵州省作家协会，是贵州省文联历史上的第一个专业作家。原来，贵州省作家协会是贵州省文联的下属单位，用“官本位”的谱系来说，文联是厅局级，省作协是处级。当了近五年专业作家以后，我出任省级文学月刊《山花》杂志的主编。这个杂志也是正处级，受省文联领导。因此，我既是贵州省作协的人，又是贵州省文联的人，归根结底是文联的人。千万不要笑，这不是绕口令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际情况，直到1990年我调回上海。

在贵州和上海两地领导的关心下，我从贵州省文联调进上海市作家

我是文联人

叶辛

协会工作。在上海，作协和文联是分开的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协的人。不过，这个情况只延续了一年多一点，从1990年9月到1992年7月，上海市文联换届，我当上了市文联副主席，又和文联续上了关系。尽管我先是在作协领工资，后是在文学所领工资，但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始终没有变，我当了十八九年了。

每当人家问及我的身份，我常说，我的第一身份是作家，从1977年早春出版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开始至今，我已出版了一百本书；我的第二身份是人民代表，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四届上海市人大常委，快三十年了，只比当作家的时间少几年；我的第三身份呢，就是文联的人，在贵州省文联工作时，经常以文联名义参加各种活动，到了上海，市文联时常也会派我干一些活，比如采风、出席外事活动什么的。了解情况的人对我说，你名义上挂个副主席，实际上是没权的，虚名而已。我不这样看，我认为我这个市文联副主席还是实实在在的，每次我对文联工作提出意见，基本上都能得到采纳；即便有不采纳的，也会有人郑重其事地到我这里来说明情况——这就够了嘛！不信，问一问在文联机关拿工资的职工，情况是不是这样？

十日谈 明日请看一篇《一次颇有趣的小型讲座》。

我们《中国历史之风生水起》的第八篇章，说的是后金与大明之战的萨尔浒大战的故事。

话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后，明朝立刻感到是一大威胁而坐卧不安起来。于是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进行限制。羽翼已丰的努尔哈赤也于1618年春以“七大恨”为由正式向大明王朝开战。

什么是“七大恨”呢？所谓“七大恨”是指努尔哈赤心中导致他与大明王朝结怨的七件事情：第一、明朝害死努尔哈赤祖、父；第二、明朝背弃誓言，遣兵越界，护卫叶赫；第三、明朝违背誓言，指责建州杀害出边采人参、挖矿的汉人，逼令建州十人偿命；第四、明朝派兵驱逐住在柴河、三岔和护安等三处的女真人，让其退出耕地；第五、明朝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吞并的哈达地区；第六、明朝支持叶赫，使原来许嫁努尔哈赤的叶赫老女转嫁蒙古；第七、明帝听取叶赫谗言，派人送信给后金侮辱建州。

努尔哈赤宣布“七大恨”之后，一举在1618年捣毁抚顺，攻取清河。明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，后金掠去人畜30万。

然后，1619年春，努尔哈赤再次率兵攻打

关外大战萨尔浒

——中国历史之风生水起（八）

纪连海

13000人，以杨镐为辽东经略，以杜松、李如柏、刘廷等为副，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术进攻兴京，企图一举摧毁努尔哈赤政权。

杨镐与诸将议定，分四路进攻后金，总兵刘廷率军出宽甸由东；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；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；李如柏率军出鸭绿关由南，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，皆直指赫图阿拉。此外，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，杨镐坐镇沈阳。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，洋洋得意地认为“数路齐捣，旬日毕事耳”。

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，正确地分析了形势，认为

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，声东击西的战术。努尔哈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廷军，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，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，阻击明军。两军在浑河边上相持，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。

努尔哈赤首先在萨尔浒击破明主力杜松军。然后，北击尚间崖明朝马林军。努尔哈赤又急返兴京，南击刘廷与朝鲜姜弘立军。明各路军均为所破。杜松战死，马林逃脱，刘廷战死，姜弘立被俘。从此后金对明朝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态度。

此后，努尔哈赤迅速消灭了叶赫，占领了野人女真三部中的渥集部的大部分。至此，经过30多年的努力，努尔哈赤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。

看，只要有智慧，就能够充分利用山水之势，赢得天下吧？（本章完）

中央、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，人称“国考”。我有两次参加“国考”的经历。

陈凌

我大四时，“国考”的准备既充分又认真。书店里考试资料包罗万象又杂乱无章，我选择了党史出版的资料，然后就一头扎了进去。晚上也挑灯夜战，思维每天都沉浸在解题意境之中。厚厚的复习书，像一条小船，让我没日没夜地在那里掌舵航行，寻找目标和方向。一道道令人讨厌的复习题就像是一块块乌云压在自己头上，只有破解它才能驱散乌云，迎接曙光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以笔试成绩第一的资格进入了面试。一下子，我有点恍惚，公务员考试非难也。这种骄傲情绪闪过之后，在面试备考中马虎对待，最终败北。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深深激发了我，凡事不能骄傲自满，追求成功永无止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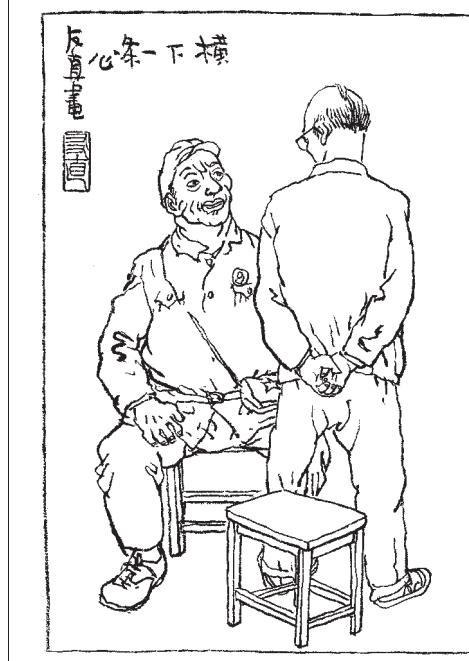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年，我又参加了“国考”。买书复习都做了精心准备，告诫自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思想。那年，又增加了申论的考试，难度更是非同寻常。为了取

“国考”的记忆

陈凌

破题，解题。自己明白：只有平时多做多练，考试时才能“笔下生辉”。对于申论，自己处在瞎子摸象的疑惑之中，是父亲金口玉言般提醒了我：煤矿爆炸屡屡发生，应急预案很有可能是今年申论主题。一席话似春风化雨，让我茅塞顿开。那年申论竟然真的考了这类题目。由于考前准备充分，对考题的要求写出来也得心应手。父亲虽然读书不多，他令人惊讶的判断力让我在考试中受益匪浅。

考后不久，一封从省考试中心寄来的成绩单让我欣喜若狂。为了避免面试重蹈覆辙，父亲还充当面试考官，让我答考题，找不足。经过三番五次地模拟练习，我对面试胸有成竹，陡然间信心倍增。结果，我以笔试和面试两个第一名的身份成功地走进公务员队伍。“国考”之难度，竟争之激烈，这种记忆将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

横下一条心

贺友直 文/图

大队”成员，最后主帅亲自出马。主帅人称“二百五”，革命群众是这么叫的，不是京剧《大劈棺》里的二百五。来由是此人体重250斤，平时以此相称真名叫啥却失传了。那天他把我叫去一对一交锋，他开门见山说：“我来自八厂，与你无怨无仇，关你不放做啥，现在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，啥辰光说，就啥辰光放。”我接话将他一军：“你说话算数？”他一愣接不上茬了。我心里想：我的专业是画故事，难道不会凭空编故事。我就说一个同党在昆仑山里，一个在天山山脉你们派人去外调好啦！反正我在这里三餐不缺，还提供睡铺，日夜有人守候，你们有胃口我有耐心，看谁耗得过谁。

五十多年前，圣野在部队就很有些名气：一、他是诗人，出版过四五本诗集，这在当时是很让人艳羡的；二、由于诗人的豪放，据说每

天早起必定大声朗诵诗句，爱人前来探亲，他

会作出甜蜜的诗来记述，还读给人听。飞语流长，我们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楼上都听到了。

不过圣野我曾见过。他身材瘦弱，军装穿得毕工毕整，浙江人，细声细气地说一口蓝青官话，那模

样恰如著名诗人唐湜所描述：“见了人就有点怯生生，很少说话，只有眼镜后

臧克家等同志的书简。这是轰动文艺界的一件大事，大家都争购一册予以珍藏。3月初，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，有人反映：圣野在他工作的浙江军区速中

举办文学讲座时，专题讲述毛主席诗词，反应颇为热烈。这事，顿时引起大家的关注。有人说，给部队干部讲主席诗词，是一件新生事物，诗人讲诗，定有一番精彩；也有人担忧，以为主席的诗词博大精深，还没有好好学习消化，就登台开讲，会否曲解原意？更有甚者认为，上面没有统一讲稿，主席的诗词是可以随便讲解的吗？意见越来越严厉，幸而司今科长是位老文化人，懂得文人的习性，立即作了阻止，言

道：没有看到的事，别急于下结论。我们可以借下去作调研的机会，顺便察访详情，也可能是值得肯定的好事呢。

果然，不久就组织了一个三人调研小组，一人调研学校行政教务，一个调研数理学科，我则调研文史一堆。我们于3月中旬乘车南行，经上海到杭州，再转车到上虞境内的五夫。军区速中设在五夫镇的北端，学校早知道我们要来，但圣野不知此中有我，见了面分外兴奋。

和妹妹通长途电话，她语带警告：“最近你可要小心应对，叔叔那封信爸已经看到了，他很生气你把事情给瞒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爸来信说在你的抽屉里发现的！”

唉，怎么会这样。我挂上电话，心情快快。

这些年来，故乡亲人的信息一波一波辗转传来，多数年长一辈的家人，困于疾病。每来一封信，对常年患有高血压的父亲都是一种刺激。

所以当姑姑过世的信息传来以后，我与妹妹、母亲共同商定，暂时瞒着二度住院的父亲。我们都担心父亲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可能发病。但问题是，父亲居然从我的抽屉里翻出了妹妹转来的家书！

真是的，这件事要怎么说才好呢？我记得很清楚：

打从上小学开始，父亲就自设了一套“检查制度”，对于我们的一举一动从不放松！譬如悄悄从窗口经过；暗地打开房门；甚至不知不觉出现在背后，就是想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写功课或是读书；当然，我和妹妹的警觉性也就在面对道高一尺中演练成了魔高一丈。

但父亲毕竟武艺高强。初三那年，他从我书桌抽屉底层搜出一叠男生的信，等我发觉后，那些信早已撕成碎片被扔进门前河沟里了。

少年的我，个性是极顽强极具叛逆的，信件的被“窃”及“毁弃”早已令我怨愤不已，没想到，接着又发生不但日记被父亲偷看而且怒斥我日记“内容不当”的事件，更加引发我的不满。总而言之，父女二人为此大吵一场之后，我是下定决心不再写任何日记、札记了。

可是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？父亲难道已经忘记我早已不是个孩子？前后十多天吧？我为姑姑过世的信不断自问和犹疑着。如果，如果父亲责备我为什么欺瞒他，我是否也要像当年一样理直气壮地抗议：“你为什么老要……！”

一天一天地过去，也许是母亲的劝解，也许是妹妹来信为我脱罪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但就在昨天傍晚，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，忽然不经意地冒出一句：“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抽屉收拾得整整齐齐的，不像你妹妹，一团乱糟糟……”他那毫无心机的模样，似是一点也不在意什么，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。

事情，当然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落叶泪

郑树林

感叹秋风的无情，把大自然绿色之叶，摧残得落地无声，秋风，如无影之刀，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，洒落在土地上，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，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，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生活的新欲望。

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，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。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，几乎整日陪着我进行工作。到了礼拜天，他就鼓动我们爬山，说春天山上有兰花，其香可喜。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，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，大家任意采集，别在胸前，插在头上，放浪形骸，浪漫了一通。晚上，除了工作，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。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，九点一过，统一熄灯，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，那跳动的火焰，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。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，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，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。

“五一”后一周，我们回到南京，给大家作了汇报。我以为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，没有出格之处，应予肯定；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，尤可钦佩。司今科长仔细聆听，频频颔首微笑，那笑容我至今难忘。

然而，未及一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，政治形势大变，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。未几，圣野和我都被复员转业，但都到了上海，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，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，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，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。我们事后谈起，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，或有什么商榷之言，那么，他就难逃一劫。